

元代戏曲史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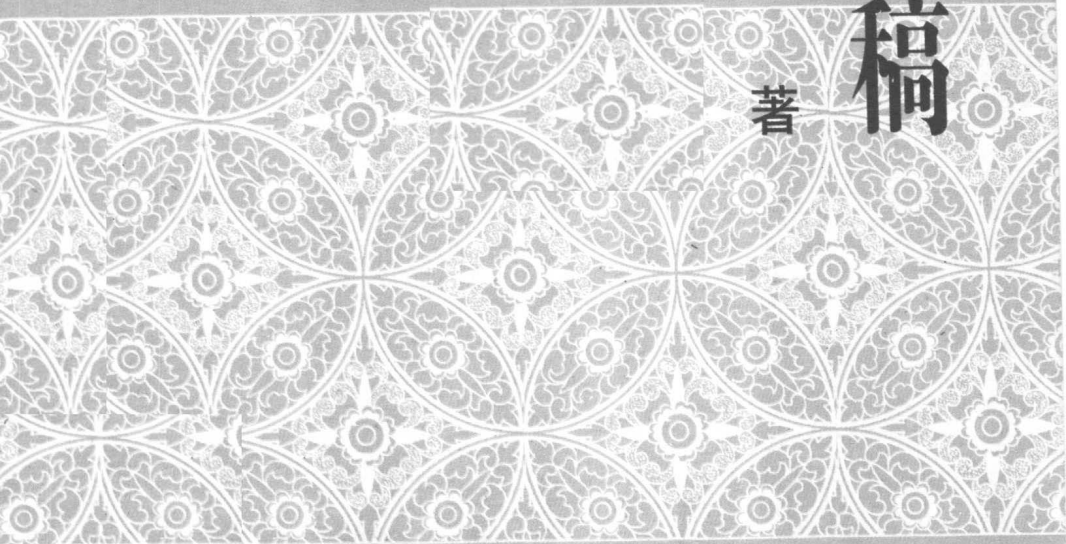
黄卉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元代戏曲史稿

黄卉 著



元代戏曲史稿

黄 卉 著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7.5 印张 1 插页 450 000 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7—80504—477—5/J·71

定价：30.00 元

自序

周贻白先生在《中国戏剧史长编》的《自序》中说：“时代进展，一日千里，本书虽有修订，错误必所难免，明知不符作史之旨，但请作为资料以备参考可也。”这当然是非常谦逊的话。近现代以来，从王国维到吴梅、贺昌群、郑振铎、阿英、周贻白以至日本的青木正儿、盐谷温诸位先辈，在中国戏曲史方面，披荆斩棘、开拓建设之功，是足可彪炳史册的。他们的巨大贡献，有目共睹，不可抹煞。但是，周先生的话，也包蕴了一面真理——确实是“时代进展，一日千里”，学术研究、艺术史的探讨，不可能“止于至善”，一成不变了。而中国戏曲史领域的开拓，也不过八九十年，许多问题还有争议或者存疑，探讨的天地非常广阔。近十几年来，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步开放，在五六十年代研究的成果基础之上，敢于提出自己的学术主张，“百家争鸣”之势甚旺。以

元曲和戏曲史研究来说，参与者之众，涉猎之深广，都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对元曲形成的轨迹、盛衰的原因、作家作品的评价，都有许多新鲜见解。有些重要问题，也形成了正常的争论。有些地方还举行了海峡两岸和国际性的元曲研讨会，丰富了元曲研究的视角，拓宽了元曲研究的领域，这都是非常必要的，十分令人欣慰的事情。

但是，个人近年来阅读了几种八九十年代出版的中国戏曲史和元代杂剧史专著。感到这些专著比起过去戏曲史著作，眉目更清楚了，对事物的评价更准确了，结构也更严谨了，有相当学术价值。然而，又感到这些专著还有些不足。

(一)有的专著过分强调了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由于过分强调，给人印象就是元代一切都不足取，或多或少流露出大汉族主义的情绪。而对元代，特别是前期造成的那种在思想文化方面比较宽松活泼的人文环境——这是元杂剧、散曲勃兴的决定性因素，则视而不见，甚至连元代前期鼓励生产发展和商业繁荣的措施也不承认，连《马可·波罗游记》客观描述的可靠性都表示怀疑。

(二)没有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比较的方法，特别是当时与欧洲，以时代对比的方法来探讨戏剧这一文化现象各自发展的程度、

影响和特点。

(三)对元代戏曲，尤其是杂剧，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估计不足。它虽然在时间上晚于古希腊罗马戏剧和印度梵剧，但在题材的广泛性、主题的强烈社会现实性和文化普及性等方面远非希腊、印度古剧可比，它比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莎士比亚要早300年，构成当时的一座文化高峰。十八九世纪西方一些学者囿于欧洲传统的“三一律”、悲喜剧概念来批评具有中国特色的元杂剧，不过是“欧洲中心论”的一种反映，是严重的艺术局限性和保守观念，应该破除之。

(四)有些具体问题，如关汉卿并不是金代生人，也不是杂剧的创始作家，而是杂剧鼎盛时期的主要代表作家，但目前的许多戏剧史，仍然因袭前人的旧说，把他说成是由金入元并且是创始期的主要作家。另如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作为最早期文人涉足杂剧创作的作家并且是领袖人物的地位，在许多戏剧史著作里不但不予证实，而且连“大家”的名次都排不上。这不能说是公允的。

根据以上种种，深感有重新起草一部戏曲史的必要。而写中国戏曲史，非常关键的则是元代。以往的戏曲史，对金院本、诸宫调怎样互相融合发展而成独立的元杂剧这个关键问题，往往略而

不谈；对作家则由于生平资料太少，就主要进行作品分析，而这种分析如果脱离作家的思想实际，就会出现一些主观臆测的结论。

由于这些情况，本人大胆试着摸索了一番元代的戏曲史，整理出这部《元代戏曲史稿》——实际是抛砖引玉，就正于戏曲界的前辈学者和同行，如果能引起戏曲界、学术界的注意和讨论，并在进一步研讨的基础上，产生出若干部更科学、更详备的戏曲史著作，从而把中国戏曲史的研究大大推进一步，就达到了作者的初衷。

黄 卉

1995年4月于北京大学

目 录

| | |
|---------------|-----|
| 第一章 绪 论 | 1 |
| 第一节 元代社会概况 | 1 |
| 第二节 戏曲的起源与演进 | 13 |
| 第三节 宋杂剧与金院本 | 27 |
| 第二章 元杂剧的崛起与发展 | 51 |
| 第一节 元杂剧的崛起 | 51 |
| 第二节 元杂剧的体制 | 83 |
| 第三节 白朴与真定作家群 | 94 |
| 第四节 关汉卿与大都作家群 | 124 |
| 第五节 马致远与他的杂剧 | 172 |
| 第六节 王实甫与《西厢记》 | 189 |
| 第七节 郑光祖与平阳作家群 | 223 |
| 第八节 乔吉与其他重要作家 | 249 |
| 第九节 无名氏杂剧 | 285 |
| 第十节 元杂剧的衰落 | 303 |
| 第三章 宋元南戏 | 308 |
| 第一节 南戏的渊源 | 308 |
| 第二节 南宋的杂剧和戏文 | 321 |
| 第三节 南戏的体例 | 331 |
| 第四节 宋元南戏的思想内容 | 336 |

| | | |
|------|-----------------|-----|
| 第五节 | 高则诚与《琵琶记》 | 349 |
| 第六节 | 南戏的复兴与荆刘拜杀等元末诸剧 | 376 |
| 第四章 | 元代戏曲的审美形态 | 403 |
| 第一节 | 壮美与优美 | 404 |
| 第二节 | 悲剧 | 412 |
| 第三节 | 喜剧 | 428 |
| 第五章 | 元代戏曲的理论批评 | 440 |
| 第一节 | 元代的戏曲理论家 | 440 |
| 第二节 | 关于戏曲社会功能的理论 | 444 |
| 第三节 | 关于戏曲的产生、发展的研究 | 449 |
| 第四节 | 论戏曲作家和演员 | 453 |
| 第五节 | 关于戏曲本体的论述 | 456 |
| 第六章 | 元代戏曲演出活动方式 | 462 |
| 第一节 | 书会与戏班 | 462 |
| 第二节 | 勾栏演出 | 466 |
| 第三节 | 农村做场 | 469 |
| 第四节 | 酒楼茶肆和家庭献艺 | 472 |
| 第五节 | “唤官身”及其他 | 475 |
| 第七章 | 元代戏曲的舞台艺术 | 478 |
| 第一节 | 城镇勾栏与农村戏台 | 478 |
| 第二节 | 音乐 | 486 |
| 第三节 | 表演艺术的特色 | 500 |
| 第四节 | 舞台美术 | 518 |
| 结语 | | 536 |
| 参考书目 | | 541 |
| 后记 | | 548 |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元代社会概况

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以一个突然崛起于中国北方的，文化、经济十分落后甚至连文字都没有的少数民族，凭借着蒙古贵族所组建的，集军事、生产、行政为一体的强悍力量，迅速夷灭了西夏、大金和南宋政权，同时西进中亚、东欧。蒙古人的弯弓铁马，征服了千百个大小国家部族，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空前大帝国。这一使欧洲人极度震惊的所谓“黄祸”的残暴掠夺、屠杀和占领，既给许多国家、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融合，和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当时，中国人的足迹遍及中亚、阿拉伯、欧洲甚至非洲。我国古代的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罗盘针，就是这个时期先后传入欧洲的；其他如驿站制度则被波斯和埃及所采用；我国的天文、历算、医药，也传播到阿拉伯。世界各地的人士也纷纷来到中国，把东罗马的医药、回回的历法介绍进来，促进了人类的文明、进步。

从成吉思汗到蒙哥时代，蒙古人所征服的中国以西的欧亚地域极其广大；但是，所建立的窝阔台、察合台、伊儿、钦察等四个大汗国，只是名义上臣属于元朝，实际上元蒙最高统治集团并不过问他们内部的事务。因此，我们这里所称述的元代，如同

《元史》，只限于中国版图之内。元代的疆域比起汉唐时代更加广阔，“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①

蒙古贵族完成了分裂 300 多年的国家统一大业，主要是利用金、宋王朝的日趋腐朽和自己拥有强大、野蛮的军事力量取得的。他们在征服中原地区的过程中，大肆掠夺和烧杀，强夺了大片良田改作牧场，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掠夺大量民众的金银财富，使工商业也遭到损失。但是蒙古人却是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他们在实践中，在中原高度发展的农业经济和发达的工商业的影响之下，和在汉族大臣的反复建议之下，从元太宗窝阔台，特别是元世祖忽必烈，改变了原来的许多方针政策。忽必烈十分重视并积极采纳汉族知识分子的建议。“柱石四朝”的名将史天泽（1201—1274），“世祖即位，首召天泽，问以治国安民之道”。史天泽提出“朝廷当先立省部以正纪纲，设监司以督诸路，霈恩泽以安反侧，退贪残以任贤能，颁奉秩以养廉，禁贿赂以防奸，庶能上下丕应，内外休息。”“帝嘉纳之。”第二年，任命史天泽为中书右丞相。“天泽既秉政，凡前所言治国安民之术，无不次第举行。”^②许衡（1209—1281）提出“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③；刘秉忠提出“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④；姚枢（1201—1278）陈述“上答天心，下结民心，睦亲族以固本，建储副以重祚，定大臣以当国，开经筵以格心，修边备以防虞，蓄粮饷以待歉，立学校以育才，劝农桑以厚生”^⑤等等。所有这些都为具有雄才大略的英明皇帝忽必烈所认真听取，嘉纳实行，并且收到了明效大验，从中统、至元、元贞、大德、至

① 《元史·地理志》，中华书局点校本第 1345、1346 页。

② 《元史·史天泽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 3660、3661 页。

③ 《元史·许衡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 3718 页。

④ 《元史·刘秉忠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 3688 页。

⑤ 《元史·姚枢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 3715 页。

大、皇庆、延祐以及至治等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 60 多年，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取得了蓬勃发展，形成了戏曲家贾仲明热情赞颂的“元贞大德秀华夷，至大皇庆锦社稷，延祐至治承平世”的安定、进步的政治局面。

首先，农业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忽必烈执政之后，设立了大司农和诸路劝农使司，巡行劝课农桑，务使农事发展，奖励开垦荒地，推行屯田制度。至元二十三年（1286），“诏以大司农司所定《农桑辑要》书颁诸路”^①。元世祖至元三年（1267）“命行中书省、宣慰司、诸路达鲁花赤^②、管民官，劝诱百姓，开垦田土，种植桑枣，不得擅兴不急之役，妨夺农时。”^③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诏江浙行省印《农桑辑要》万部，颁降有司遵守劝课。”^④据《元史·刑法志》载：“诸劝农官，每岁终则上其所治农桑水利之成绩于本属上司，本属上司会所部之成绩，以上于大司农。若部，部考其勤惰成否，以上于省而殿最之。其在官怠其事，隳其法者，罪之。”在官方重农政策的影响下，王祯的《农书》、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等专著也在这个时期刊刻行世。政府还推广了从印度传入的棉花良种。元世祖忽必烈又设置了“都水监”、“河渠司”，请郭守敬（1231—1316）等著名科学家、技术专家规划疏浚河渠，修治了黄河，开了会通河、通惠河，修渠引水，疏导江湖，大兴水利，这些措施都使元代农业有了很快发展。

手工业也很发达。元代曾把手工业工匠编为“匠户”进行专门管理。他们广泛征收民间工匠，设置专门机构管理，免除了他们杂泛差役，一顷以内的耕地免征税粮，完成官府规定的定额之后，工匠还可以自由生产。这一方面由官府垄断、掠夺工匠们的

① 《元史·世祖本纪十一》，中华书局点校本第 290 页。

② “达鲁花赤”即断事官，一般地方行政长官由汉人担任，另加一名蒙古人或色目人任“达鲁花赤”，是监督汉官的。

③ 《元史·世祖本纪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 84 页。

④ 《元史·仁宗本纪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 571 页。

劳动成果，同时也扩大了生产规模，保证了产品质和量的提高。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以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领颍州、光化互市，及领已括户三千，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就铸农器二十万事，易粟四万石输官。”^①文宗天历（1328—1330）时，盐的总产量达到2564000多引，每引重400斤，则合10亿多斤^②。武宗至大三年（1310），尚书省报告：“上都、中都银冶提举司达鲁花赤别都鲁思，去岁输银四千二百五十两，今秋复输三千五百两，且言复得新矿，银当增办。”^③纺织业也有重大发展。松江府劳动妇女黄道婆，流落海南岛数十年，带回了黎族人民的纺织技术和工具，并加以改进，工效猛增几倍；当时已能织出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各种花纹，技术水平相当高超了。海州就有绢庄二座，由大商人出资开设。回族工匠用金线混织的“纳失失棉”在国内外颇负盛名。铜筒火炮的铸造，也是世界兵器史上划时代的大事。

由于元代水陆驿站的普遍设置和南北大运河的贯通，使国内外商业空前繁荣活跃。各种精美的纺织品，景德镇白瓷和青花瓷，和各种手工艺品，远销亚、欧、非各大洲140多个国家。从外国也输入了大批珍宝、香料、皮货之类。在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写的《游记》中，谈到他从在海关的一名官吏处得知，只杭州一处，“每日胡椒的销量竟达四十三担，每担重达九十公斤。”^④而泉州，“运往那里的胡椒，数量非常可观。但运往亚历山大供应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就相形见绌，恐怕不过它的百分之一吧。刺桐（指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⑤元朝政府在泉州设立了“行泉府

① 《元史·世祖本纪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92页。

② 《元史·食货志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392页。

③ 《元史·武宗本纪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29页。

④ 《马可·波罗游记》第二卷第七十六章。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⑤ 《马可·波罗游记》第二卷第八十二章。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司”，管理海外贸易，控制海舶达 15000 艘。当时指示航行的六胜灯塔，至今还完好无缺。这种繁盛的内外贸易活动，对朝廷的财政收入和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其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在政治上，忽必烈早在潜邸时就重武功文治，网罗了许多有作为的汉族知识分子做为参谋。他一直潜心习学汉法，“思大有为于天下”^①。他在即位诏书中就说：“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先皇帝（指其兄宪宗）即位之初，风飞雷厉，将大有为。忧国爱民之心虽切于己，尊贤使能之道未得其人。”所以他下决心依靠汉族大臣的治国治民经验，改弦更张，建设纲纪法规，建立健全国家和地方的行政机构，完善军事、赋税等制度。他下令颁布治国“条格”，“均赋役，招流移”，“禁勿擅用官物”，“勿擅科差役”，“恤鳏寡，劝农桑，验雨泽，平物价”^②等等。他还多次精简机构，裁减冗员；禁止近侍人员为人求官，以防紊乱选举制度。“官吏受贿及仓库官侵盗，台察官知而不纠者，验其轻重罪之。中外官吏赃罪，轻者杖决，重者处死。言官缄默，与受赃者一体论罪。”^③他还令中书省议立“登闻鼓”，“冤无所诉，听其来击”^④。他十分看重涵养民力的政策，多次下令减免赋役。他对曾在南宋统治下的所谓“南人”也是安抚的，颁告降附官吏、士民、军匠人等，“令农者就耒，商者就途，士庶缙黄，各安已业，如或镇守官吏妄有骚扰，诣行中书省陈告。”^⑤他还对南宋湖北制置副使、降后改任元朝行省参知政事的高达表示了莫大的信赖，诏谕说：“昔我国家出征，所获城邑，即委而去之，未尝置兵戍守，以此连年征伐不息。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虽得其地而无民，其谁与居？今欲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

① 《元史·世祖本纪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 57 页。

② 《元史·世祖本纪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 98 页。

③ 《元史·世祖本纪九》，中华书局点校本第 246 页。

④ 《元史·世祖本纪五》，中华书局点校本第 165 页。

⑤ 《元史·世祖本纪五》，中华书局点校本第 161 页。

人未之知也。尔熟知其事，宜加勉旃。湖南州郡皆汝旧部曲，未归附者何以招怀，生民何以安业，听汝为之。”^① 这可以说是对以往屠城抢掠、毁田为牧政策的严肃反思，能说出“蒙古人未之知也”这样的话是很不容易的，也表示相信高达能够“使百姓安业力农”。

至元二十四年(1287)，忽必烈诏以程钜夫为尚书省参知政事，钜夫固辞，“又命为御史中丞，台臣言：‘钜夫南人，且年少。’帝大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程钜夫又举荐了赵孟頫、余恁、万一鹗、张伯淳、胡梦魁、曾晞颜、孔洙、曾冲子、凌时中、包铸等 20 余人，“帝皆擢置台宪及文学之职。”^②

忽必烈还批准了中书省这样的建议：“天下重囚，除谋反大逆，杀祖父母、父母、妻杀夫、奴杀主、因奸杀夫，并正典刑外，余犯死罪者，令充日本、占城、缅甸军。”这就极大地缩小了死刑的范围。

大德七年，元成宗“诏遣奉使宣抚循行诸道”，检视政绩民情。七道奉使宣抚所罢赃污官吏达 18473 人，赃 45865 锭，审冤狱 5176 件。^③ 这在当时的蒙汉官吏中占了很大比重，一方面说明当时吏治的腐败，也说明元蒙统治集团下了极大的决心要整饬官吏队伍。当然，蒙古、汉族的贤官廉吏也有不少，元世祖、成宗时代曾经做过“平章政事”、“御史中丞”的色目人不忽木，一向刚正无私，河东守臣来京献“嘉禾”，大臣们均以为瑞，欲奏皇帝。不忽木问道：“汝部内所产尽然耶，惟此数茎耶？”回答说：“惟此数茎尔。”他说：“若如此，既无益于民，又何足称瑞？”于是罢遣回去了。这样一个朝廷重臣，“家素贫，躬自爨汲，妻织纴以养

① 《元史·世祖本纪五》，中华书局点校本第 166 页。

② 《元史·程钜夫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 4016 页。

③ 《元史·成宗本纪四》，中华书局点校本第 449、456 页。

母”^①，年仅46岁就病逝了。“御史中丞不忽木卒，贫无以葬，赐钞五百锭。”^②不忽木还是一位散曲作家，他仅存的一套套数《辞朝》是很有影响的。

忽必烈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机构。中央在皇帝之下，设立了中书省，管理全国行政事务；枢密院，管理全国军政事务；御史台，监察官吏政绩和政治得失。中书省设右、左丞相，平章政事，右、左丞，参知政事等行政首脑，统管六部；枢密院设枢密使、枢密副使；御史台设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地方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全国除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归中书省管辖，称为“腹里”之外，设11个行省。行省设丞相。行省下设路、府、州、县等行政机构。元世祖至元年间，在江浙行省泉州路同安县设立了澎湖巡检司，负责管理澎湖和台湾事务。元朝还在中央设立宣政院，管理佛教和西藏地区行政事务。还在西藏设立了“宣慰司都元帅府”。行省是秦朝郡县制度实行以来的重大发展，对后世影响很大，至今仍显示着它的生命力。

从元世祖忽必烈到成宗、武宗、仁宗这60多年，元代社会政治比较清明，经济有所发展，社会比较稳定。姚枢评论说：“自中统至今五六年间，外侮内叛继继不绝，然能使官离债负，民安赋役，府库粗实，仓廩初完，钞法初行，国用粗足，官吏迁转，政事更新。”^③如同恩格斯指出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④活动。这之后的几十年政权巩固、生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形成了马致远在晚年热情歌颂的：

① 《元史·不忽木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171、3172页。

② 《元史·成宗本纪三》，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1页。

③ 《元史·姚枢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715页。

④ 《卡尔·马克思的葬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4页。

〔中吕·粉蝶儿〕至治华夷

〔粉蝶儿〕至治华夷，正堂堂大元朝世，应乾元九五龙飞。
万斯年，平天下，古燕雄地。日月光辉，喜氤氲一团和气。

〔醉春风〕小国土尽来朝，大福荫护助里，贤贤文武宰尧天。喜，喜。五谷丰登，万民乐业，四方宁治。

〔啄木儿煞〕善教他，归厚德。太平时龙虎风云会。圣明皇帝，大元洪福与天齐。

他在另一首套曲〔中吕·粉蝶儿〕《寰海清夷》中也作了类似的歌颂，像马致远这样的一流曲家，是不会无原则的歌功颂德的。

当然，元代社会决不尽是黑暗，但也并非无限光明。元代终究是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互相交织的时代，人民群众在某些地区、某些方面所受的压榨，重于其他朝代，而在有些地区和有些方面，则比其他朝代要好得多。我们应该不怀偏见地加以分析和评述。在元代，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最突出的表现，在统治者实施的民族歧视政策。

这种民族歧视政策，首先反映在政治上的不平等。最高统治集团把国内人民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居首，色目人居次，汉人（原金朝统治下的汉族人和女真族人）居三，南人（原南宋统治下的汉族人）居末。这当然是明显的民族歧视政策，也是较小民族的贵族取得全国统治地位之后，为确保自己统治地位，所必然采取的民族政策。

这种歧视表现在政权构成上，当时确有在中央官署中“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①，“世祖之约，不以汉人为相，故为相皆国族。”^②明人叶子奇在《草木子》中说：“天下平治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不

① 《元史·百官志》，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120页。

② 梁寅《梁石门集》卷八。